



唐昭宗天复二年(902年),名扬海外的一代诗僧贯休,终于决定选择蜀地作为生命的最后归宿。这一年,黄巢起义席卷大半个中国,兵火连年,战祸惨烈,“大河之北,易水之南,久困兵戈,聚成疮痍,男孤女寡,十室九空”“江淮之间,东西十里,扫地尽矣”。这一年,贯休的故交好友韦庄、卢延让在蜀中受到前蜀皇帝王建的重用,发出了“故人多在蜀,不去更何之”的感慨。古稀之年的贯休,带着对命运和时代的切肤之悟,做出了人生中一个重大决定:“一瓶一钵垂垂老,千水千山得得来。”他从黔中(今湖南怀化)出发,经三峡,沿长江逆流而上,于次年初春到达成都,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十年。

贯休:暮年逢盛世 归宿在成都

□许永强

壹

孤云野鹤屡被逐

贯休俗姓姜,婺州(浙江金华)兰溪登高里人。生逢乱世,7岁家道衰贫,弟妹早逝,被送至兰溪和安寺出家为童侍,请圆贞禅师为师,法名贯休。贯休“幼而颖悟”,天赋得以表现,日读《法华经》千字,过目不忘。诵经之余,习诗古文辞,勤练书法,又雅好吟诗,常与邻院的童侍隔篱论诗,或吟寻偶对,或彼此唱和,有僧见之惊异不已,15岁即诗名远近皆闻。

生活在一个不安定的社会里,即使入佛门也难有清净。唐会昌五年(845年)朝廷强迫僧尼还俗,拆除寺院,销毁经像,史称“会昌法难”。和安寺奉敕拆毁,贯休随师入山潜修。他20岁开坛讲法,年近30到洪州(今江西南昌)游学,除了与地方官员和僧道交游唱和外,都在山林间隐居。48岁那年,黄巢攻兰溪,为避战乱,贯休云游燕、豫、冀、秦之地,并登西岳华山,自称“西岳僧”。花甲之年,至杭州,居灵隐寺。

贯休的讽刺诗备受世人推崇。他不拘小节,有一种坦荡刚直的个性气质。这从之后发生的两件事可以看出。896年,润州(治所在今江苏省镇江市)刺史钱鏐因平定董昌之乱有功,被授予镇东军节度使,钱鏐自称吴越王。住在灵隐寺的贯休前往钱府赋诗《献钱尚父》祝贺,诗中有一句:“合座花醉三千客,一剑霜寒十四州。”钱鏐有统治全国的野心,要求他把“十四州”改为“四十州”才许相见。贯休对其傲慢极为反感,又不满其日益膨胀的政治野心,愤然道:州难添,诗亦难改。孤云野鹤,何天不成飞?说罢便拂衣而去,离开杭州。

65岁时,贯休来到荆南,与贬官至此的诗人吴融交往唱和,结识了荆南节度使成汭。时值成汭寿,贯休写诗贺,却被评为第三名。贯休非常生气。之后,成汭想跟贯休讨教书法要旨,贯休觉得成汭不是那块料,于是语带讥讽地说:“此事须登坛而授,岂可草草!”恼羞成怒的成汭当下把贯休赶出了荆南。

两年后,贯休再至荆州,当时的节度使是朱温的亲随牙将高季兴。高季兴经常截留各国贡品,又为获取赏赐而向诸国称臣,反复无常,被称为“高赖子”。贯休有感于时政,作诗《酷吏词》以讽刺高氏,诗中有“蝗乎贼乎”句,惹怒了高季兴,再次被驱离。

三度以诗不合而被官员驱逐,在郁悒之时,已是垂暮之年的贯休把眼光投向了无战乱之忧、政治相对稳定的蜀地。以“干戈定秦蜀”镇压农民起义发迹的王建,正处于创建前蜀政权过程之中,他礼贤下士,向天下人才伸出了橄榄枝。

贰

蜀中盛世慰晚年

贯休的到来,让王建十分高兴,“盛披礼遇,赐赉隆洽”,呼贯休为“得



《十六罗汉图》之一 日本高台寺本。

得和尚”。“礼待膝之前席,过秦主待道安之礼,逾赵王迎困澄之仪”,赐紫袈裟,留住成都东禅院,并命新建禅院。历经磨难、年老体弱,漂泊了大半生的贯休在自己古稀之年能受到这样的隆恩厚遇,感激之情溢于言表。他在《陈情献蜀皇帝》中写道:“河北江东处处灾,唯闻全蜀勿尘埃。一瓶一钵垂垂老,千水千山得得来。奈苑幽栖多胜景,巴歛陈贡愧非才。自惭林藪龙钟者,亦得亲登郭隗台。”将自己遇蜀主王建比作郭隗之遇燕王,可见其欣喜之情。

王建对贯休敬重有加,时常向他讨教治蜀之策。贯休也频繁得到建王的赏赐。903年,贯休在大慈寺讲经,王建亲临听讲,贯休遂作《蜀王入大慈寺听讲》诗以纪其事。

907年,王建建立前蜀,封贯休为“大蜀国龙楼待诏、明因辨果功德大师、祥麟殿首座、引驾、内供奉、讲唱大师、道门子使选鍊校授、文章应制大师、二街僧录、封司空、太仆卿、云南八国镇国大师、左右传真龙华道场对御讲赞大师兼禅月大师食邑八千、赐紫、大沙门”。这一串长达90多字的头衔堪称“冠绝古今”,足见王建礼遇之隆盛。

蜀中社会稳定,经济富庶,人民安居乐业,这让饱受战乱、居无定所的贯休受到了强烈震撼——这才是他笔下的美景。他写了《大蜀高祖潜龙日献陈情偈颂》《寿春进祝圣七首》《蜀王入

大慈寺听讲》《大蜀皇帝潜龙日述圣德诗五首》等诗,描绘蜀中繁荣富裕、边疆和睦安康的情景。在长达百句的五言律诗《寿春节进》中一派盛世景色:“家家锦绣香醪熟,处处笙歌乳燕飞”,称赞大蜀“盛如唐创业,宛胜晋朝仪”“境静消锋镝,田香熟稻糜”“轩项风重振,皇唐鼎创移”,以此称颂王建“俭德为全德,无思契十思”的治国之道。在《大蜀皇帝寿春节进尧铭舜颂二首》中,更将王建比作尧舜“能当浊世为清世”。在《蜀王登福感寺塔三首》中,称誉王建天资忠孝,心地慈善,弘扬佛法,是阿育王再生,在其治理下,蜀地安宁富庶。

贯休也并不是一味地歌颂。王建有一天到龙华寺游览,召贯休念新作给他听。此时显宦贵戚都在场,贯休有意要讽刺一下这帮酒囊饭袋,便读了《少年行》三首:“锦衣鲜华手擎鹞,闲行气貌多轻忽。稼穡艰难总不知,五帝三皇是何物。”“自拳五色球,进入他人宅。却捉苍头奴,玉鞭打一百。”“面白如削玉,猖狂曲江曲。马上黄金鞍,迳来新赌得。”辛辣地讽刺了那些一无所成,只会吃喝玩乐的贵族子弟,对这些“公子少年”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,惟妙惟肖。王建听罢拍案称绝,而贵戚们却如坐针毡,对他恨之入骨。

《读杜工部二首》是贯休淹留成都时的作品,他在其二中吟道:“甫也道亦丧,孤身出蜀城。彩毫终不掇,白雪更能轻。命薄相如命,名齐李白名。不知来阳令,何以葬先生。”想当年杜甫遭逢安史之乱,避难蜀中,凄惶奔忙,才华与李白相颉颃,命运却相如一样可悲叹。贯休与杜甫,真有遭遇相似,同病相怜之感。

前蜀永平元年(911年),成都龙华禅院(后改名金绳院)建成,王建请79岁的贯休担任住持。同年2月,王建到龙华禅院,赐号贯休“禅月大师”,又赐茶、药、彩缎,并请吟诵近作。王建待贯休“曲加存恤,优异殊常”。太子王衍曾奉命请贯休在青城山金华宫为太后、太妃玉容写真。贯休入蜀后,备受恩宠,晚景安适,作《鼓腹曲》:“我昔不幸分遭百罹,苍苍留我兮到好时。耳闻钟鼓兮生丰肌,白发却黑兮自不知……”

永平二年(912年)12月,80岁的贯休圆寂。临终前,他留下遗言:“古人有言曰:‘地为床兮天为盖,物何小兮物何大。苟愜心兮自欣泰,身与名兮何足赖。’……汝等以吾平生事之以俭,可于王城外藉之以草,覆之以纸而藏之,慎勿动众而厚葬焉!”但王建下令厚葬,于翌年3月,在离成都都不远的丈人山(今青城山)峰下修建贯休塔,敕谥“白莲塔”(今塔不存)。贯休在蜀中度过了一生中的最后十年,受到蜀主礼遇,目睹蜀中盛世,也算是实现了他“须佐圣明君”的愿望。

叁

画成罗汉惊三界

在中国书画名家谱系里,贯休的名字如雷贯耳。贯休工篆、隶、狂草,尤以草书为胜。其狂草属于张旭、怀素一路,但又风格独特,人以其俗姓姜而称其书法为“姜体”。宋《宣和画谱》称其“作字尤奇拙,至草书益胜……有草书《常侍帖》《千文帖》留传。”可惜其书法作品无一件传世至今,实乃书法史之遗憾。

好在贯休的绘画还有传世。贯休能作水墨、设色人物及工笔人物肖像,又能以纯淡墨画竹树、黄雀,虽墨为之,如具五彩。虽然存世的作品不多,但是所塑造的罗汉形象,一直未曾有人超越。

贯休所绘罗汉,气韵高古,性格奇特,不类常人:“丰颐颡额,深目大鼻,或巨颡枯项,黝然若夷捺异类,见者莫不骇瞩。”以高古游丝描作罗汉衣纹,圆劲少顿挫,仍富秀劲古逸之气韵。山石多勾斫,晕染适度。有人问贯休为何以这般画罗汉。贯休说:“梦中所睹尔。”又画释迦十弟子,亦如此类,人皆异之。可见贯休绘画主要是画佛像,而且创作方式很奇特,主要是将梦中看到的形象而形之于笔端。贯休也曾参照自己的长相画过罗汉,《十国春秋》就有这样一段故事:“贯休常自梦得十五罗汉梵相,尚缺一,有告曰:‘师之相乃是也。’于是遂为《临水图》以足之。”

贯休绘罗汉之异于众人,一是匠心独运的创造性,二是当时西域来华僧人给贯休留下了深刻印象所致,也是为加强作品的神秘感、威慑力,使僧俗见之而生敬畏之心。这些奇特的罗汉画,上至蜀王王建,下至僧俗皆秘重,供养在成都龙华寺、豫章西山云堂院,甚至天旱不雨,还请出罗汉图“祈雨”,乃至“无不验应”。

史料记载,贯休自唐广明年间(880年)始画应真像,耗时十余年方完成十六帧,后来携画入蜀。贯休圆寂后,此画被纳入后蜀孟知祥内府。北宋至道二年(996年),太宗赵灵下令搜天下书画,成都府知府程羽将贯休“十六罗汉图”进呈,成为宫廷藏画。编撰于北宋的《宣和画谱》记载,御府曾藏有贯休绘佛教人物图30件,其中佛像就占了26件。至南宋时,民间还有贯休罗汉真迹和摹本。到了清代,乾隆下江南,对贯休的十六罗汉画像赞不绝口,命工匠将其刻于石,置于杭州圣因寺,特设“罗汉堂”,并亲笔修改名号,题写赞词,一像一诗。

现存世贯休名下的罗汉图不少,但几无可靠真迹,所传作品以日本宫内厅和高台寺所藏绢本“十六罗汉图”最为知名。“十六罗汉图”从绘制到流传和贯休本人的生平一样,颇具传奇色彩。虽然无可靠真迹存世,但是从这些早期临本也可以感受到他的高超画艺,其创造的“胡貌梵相”已成为艺术史上的经典形象,深入人心。